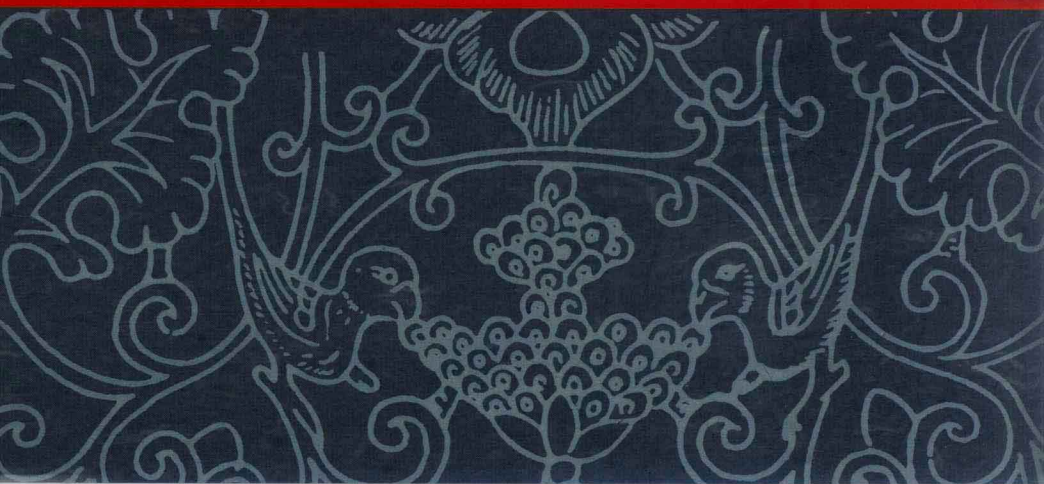


国学与现代化研究丛书

朱晓鹏 主编

浙学传统与 浙江精神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晓鹏 主编
国学与现代化研究丛书

浙学传统与浙江精神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学传统与浙江精神论集/朱晓鹏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0
(国学与现代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6631-0

I. ①浙… II. ①朱… III. ①学术思想—浙江省—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3071 号

国学与现代化研究丛书
浙学传统与浙江精神论集

朱晓鹏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266,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6631-0

B·794 定价: 5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韦政通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这种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可称之为国学。面对这种作为国学的传统文化，我们后人当然有责任要予以继承和发扬。然而，我们今天的继承和发扬，不只是一要让传统复活，而是要实现传统的创造转化。“创造转化”的观念，在中文世界，最早是由友人林毓生教授提出，近 30 多年来，这个观念在华人的文化圈、学术界相当流行。这一现象，就我的理解，它代表着不但能克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化派与传统派的长期对立与纠葛，也超越了可能缺乏自信的“中国学术思想如何现代化”的命题，将一百多年来学者们有关思想变革的看法，导入至少在心态上是相当健全的方向。“创造转化”其思想的精髓，不但对中国的思想传统在态度上应采取批判地继承，对西方文化也应做到批判地吸收，彻底解除以往“我族中心”或“西方中心”文化交流上的不平衡、不理性的状态。

按照这一思路，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转化”，至少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要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要具备现代的基本的能力、基本的知识和思考的训练，要有明确的现代意识。在这个基础上，去消化传统的思想，去思考传统的问题，给传统问题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解释。否则，以传统解释传统，还是那个样子，那它们还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因为传统在传统的那个时代，虽然是一个生龙活虎、很活泼的学术思想，但是时代不同了，你要讲活它，你要给它新生命，必须要有现代的生命去承载它，才具有现代的意义。如果还是保存传统读书人那种业已腐朽的心态，反而会把传统弄得更腐朽了！

因此,你要真正搞中国传统的東西,必须先要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人,这时代的知识基础和方法的训练都要有,然后去审视传统的思路,才能把传统讲活过来,成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甚至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要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和吸收,才可以做重建传统的创造性工作。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能使人对自己原有的文化圈产生“距离化”,从而有利于对其进行更清醒、理智的审视和批判。可以说通过吸收异质的西方文化而达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思想创造的一个重要途径。所有的创造均起始于批判。

所以,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转化”,当然要基于中国哲学的特质,但是又应该不止于此。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中西古今的融合贯通过程。譬如,我常想:如果一个中国哲学家在世界上要成为被人尊重的哲学家,如果仅仅靠知识性的成就——知识性的成就已经很难,还不能代表中国哲学家,还必须要有—种传统的儒者人格、儒者气象。你把现代种种的哲学训练和传统人格的陶养糅合在一个人身上,只要别人看到你,你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中国的哲学家。看到你,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就在你的生命和气象里整个表露出来了。这个很难,但是有这个要求,这个标准应该知道。而且我们现在应该把这个典范创造出来。所以,中国哲学的创造将面临—种很困难的境地。你要一个人在哲学上像个西方哲学家,在人格上又要像个传统中国的哲学家,这两种哲学家的形态要能够糅合在一起,那有多困难!但是如果不如这样的话,就好像不能满足中国当代的要求和发展。我觉得中国近几十年来,丧失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德行修养那一部分。讲中国文化的人,在人格、气象、光彩这方面都嫌不够!

当然,中国的国学现代化工作才起步不久,须知思想的创造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思想家不应有固守的堡垒,而要不断地去攻占新的领域,要开放地看待一切思想。所有思想,都应去尊重,不了解的应去了解。哲学是没有荒谬的东西的,哲学永远要向新的领域探求、寻思。哲学有无限的可能性,哲学应朝向无限的可能性去思考、探索。这是哲学的生命力的所在,不能如此也就是哲学萎缩的根本原因。

我个人长期从事的主要学术工作就是思考和探索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转化”问题。从 2004 年起,这些年几乎每年我都要受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讲学、工作一个时期,这不仅使我有机会把自己长期从事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转化”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讲授给青年学生,而且还与他们研究所的一支同样朝气蓬勃的学术团队有了很多的交流和合作,并借此较多地了解了他们在中国哲学研究、在国学与现代化领域的研究方面已做出的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我不仅十分赞赏他们所做的努力,而且相信他们不但能够深入地研究传统国学,更能够走出传统,实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使中国文化在未来的时代焕发和发展出更强劲的生命力。

2008 年初夏,于台北内湖。

目 录

序	(韦政通)	1
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陈 锐)	1
浙江人文精神传统及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	(吴 光)	11
浙江经济发展的初始文化背景	(邓新文)	22
两浙人文地理与价值观念之差异及其对社会 经济发展的影响	(钱 明)	66
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 ——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的一种比较分析	(陈立旭)	77
浙学与浙江精神	(滕 复)	95
南宋浙学研究的现代价值	(朱晓鹏)	107
叶适对《中庸》的批评及其对儒学的阐释	(陈 锐)	118
叶适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朱晓鹏)	135
叶适的思想品格与浙商精神	(颜炳罡)	147
王阳明哲学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陈 锐)	158
当代讲求实效精神与浙东事功学关系 再审视	(陈立旭)	169
浙东学派的经世之学和浙江区域文化中的务实 精神	(潘起造)	187
论浙东学术的实学倾向	(方同义)	198
南宋浙东学派的实学思想对浙江民众现代文化 心理的影响	(刘晓梅)	211
地域文化与浙商合作精神	(陈立旭)	224

文化传统与地方发展

——基于浙江区域的分析	(董敬畏) 241
当代浙江创新精神的浙学渊源	(张根有) 250
吴越岭南地域文化与近代科学精神	(蔡海榕) 256
现代浙江精神与未来展望	(何俊 陈红梅) 269
后 记	285
附录:本书作者简介	286

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陈 锐

在对浙东学派和浙江思想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面向,一是站在非主流的立场上对浙东文化上的某种自我认同,另一则是站在主流立场上对其批评和贬抑。此外,对浙东学派注重功利和史学所以经世的特点也存在着模糊之处,因为它们是明清社会的普遍趋向,不足以表现浙江思想的地域特征和特殊性。要准确地把握浙江精神和思想的特征,需要从自然环境的差异,文化学、社会学,以及主流与非主流的对立和变迁等角度,即将浙江思想家放在人类文化的整体和运动中来考察。浙江思想家的特征是与某种非主流文化相联系的,其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神秘主义和历史主义等特征也只有放在类似的背景上才能得到解释,他们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普遍的意义。

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随着唐宋以后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来自南方的,尤其是浙东的思想家占了相当的比例。南宋有永康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明代有王守仁、黄宗羲,到了章学诚写《浙东学术》以后,浙东学派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推崇者自然高扬浙东史学在整个清代学术中的地位,如梁启超所说:“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①许多近现代的思想家,如龚自珍、章太炎等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浙东学风的影响。

^①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00页。

那个被视为好为怪论的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和《我与我的世界》中,都为浙东列了专题,字句之间,隐约以浙东的学人自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伴随着浙江的草根经济和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浙东学派强调事功和经世致用的风格也成为人们追溯浙江精神的重要内容和源泉。

然而,在这其中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尽管当代浙江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成就凸显出了追溯和弘扬浙江精神的重要性,而且来自浙东的思想家也在唐宋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个显著的地位,但在今天为止的许多以主流或正统观点编写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或教材中,浙江或浙东学派仍然是处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像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等人在哲学史中的重要性只是由于他们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或是某种必要的补充而已,王阳明和黄宗羲被看成是当时整个时代的思想启蒙或实学思潮的一部分,很少有人会强调地域特征对于他们的思想成就的意义。除了浙江本地区外,今天的中国哲学史界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浙东学派的问题。在 20 世纪中,对浙东学派的关注和研究主要是在史学界由偏好思想的历学家来进行的。正是由于章学诚的《浙东学术》以及他本人在史学理论和方志学上的独特成就,浙东学派才会成为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在学术上获得了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像梁启超、胡适、章太炎、曹聚仁,以及余英时、何炳松、何冠彪等对之的研究实际上大多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的。

面对着这种情况,一种做法就是不满足于将浙东学派限于史学的范围,并从其他的角度强调浙东学派中注重事功、工商皆本和经世致用的成分。在新的文化背景和市场经济下,过去的那些为朱熹等正统儒学所贬抑的功利主义获得了新的认识。事实上这也确实是浙东学术的重要特征,浙江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则更加凸显出了这种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意义。但这样一来,也存在着某种危险,即如果较多地强调这种注重工商和经世致用的内容的话,则不仅可能被那些爱好理论的正统学者在学术上所轻视,又可能在事实上淡化了浙江精神的地域性意义。这就像美国的实用主义成为美国文化精神的象征,但在正统的学术领域中则始终受到轻视一样。事实上,当我们立足于浙江地域

的特殊性时,也许会感到那种功利主义传统的重要;而当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场上时,看法就可能有着相当的差异了。也许正由于这些因素,对浙江精神的研究才会停留于一个地域的范围内。黄宗羲和章学诚尽管强调浙东学术的特点及其意义,但对之的批评和贬抑却始终存在。如果说朱熹曾经视“浙学”为“专是功利”,那么当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先使用“浙东学派”时,也在客观上涉及了当时人对浙东的批评。

总的来说,在历史和现实中,一方面存在着对浙东学术和浙江精神的自我认同的需要及某种程度上的优越感,从黄宗羲、章学诚到今天都是如此,但在另一方面又始终存在着主流文化对之的忽视和贬抑。在地域意义上的浙东学术的功利主义等特色在今天的思想史上并没有得到表现,浙东在学术上的主要价值是在史学领域中。但即使在史学中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质疑,这种质疑从主流文化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全无理由的,因为在后人看来,辉煌的东西在历史上往往是在某种程度的幽暗之中的。梁启超尽管推崇浙东史学的意义,但也认为“梨洲、季野在草创时代,其方法不尽适用于后辈。实斋才识绝伦,大声不入里耳,故不为时流所尚。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学界之耻也”。^①这样来看,后来金毓黻等人对浙东学派的质疑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浙东人研史之风,元、明之世本不甚盛”,至清初,虽然“浙东多治史之士”,但他们之间也不全是“具有家法互相传受”,所以,“隐然以清代之史学为浙东所独擅,并上溯于宋之永嘉、金华,以为渊源之所自,世人之不究本末者,亦翕然以此称之。”^②即使是对浙东抱有感情的历史学家曹聚仁也说:“明中叶以后,浙东学术文化慢慢暗淡下去,至少小邹鲁的金华,后继无人;所谓浙东学派,重心移到温州(永嘉学派)、宁波、余姚、绍兴那一带去了(阳明学派)。到了清代,浙东学派实在比不上浙西学派的光芒万丈。”^③像余英时那样的史学家,尽管他承认浙东学人在地域上存在着共同的思想特征,但当他说章学诚写《浙东学术》只是一种晚年在思想上的追认以及出于某种对抗戴震的

①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08页。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

③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2页。

心理上的需要时,那种贬抑的成分也是确实存在的。

二

不管如何,要想对浙东学派以及浙江精神的特征做出准确的说明,就必须同时考虑到这双重的方面,即使是对浙东学术的批评可能也在某个角度上凸显出它的特征,也是浙江精神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那些质疑浙东学派的人的论据主要就是说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微不足道的,章学诚是默默无闻的,但这种质疑也正表现出了浙东学派的非主流的特征。因此,需要从科学的立场上对浙东学派的特征以及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作出准确的说明。简单地从浙江思想家那里找到某种成分来表明它的现代意义,这固然可以给我们增添某种信心,但它并不代表一种清晰的和准确的描述,也无法在更高的层次上解释和容纳那些反面的批评。像那种说浙江精神是讲究功利、注重工商的说法固然是正确的,但同时却又很难将其与许多注重商业或事功的地区区分开来。像广东、湖南和泉州等地都同样表现出了讲究实效、经世致用的特点,我们所说的浙江精神对它们也同样有效。像那种勇于创新、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广东、湖南精神中也是同样存在的。从历史上来看,注重工商也不是浙江思想家所独有的,所以在一些思想史的著作中,在解释南宋陈亮和叶适的事功或者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潮时,学者不大会提到当时的地域因素,而只是把他们归结为对整个国家衰弱的一种反应和要求。在明代中期以后,整个社会对商业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视商业也是时代的普遍特征。黄宗羲强调工商皆本,其他的思想家也是多少如此,顾炎武在《富平李君墓志铭》说:“关中故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①王夫之在《黄书·大正第六》中说:“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浙商是民商,徽商是儒商等也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无形中淡化了浙学在学术

^① 《亭林文集》卷五。

上的深度和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为浙学的学术意义进行辩护,强调浙学的功利并没有排斥儒学的“义”,浙学的经世致用也是以学术为前提和基础的。

此外,浙东学派注重史学的特点也存在着诸种问题或模糊之处。尽管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浙东学术》)但浙东史学的内在精神却并不是很清楚的。自从梁启超以来,一般都认为“六经皆史”代表了对宋明理学的批评,即由空洞的心性之学走向现实和经世致用,在这一点上,章学诚乃至整个浙东学术都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相一致的。这些说法在一定意义上自然是正确的,因为从宋明到清,整个中国社会都在不断地由理性的思考走向经验和世俗化的现实世界。然而,这样一来,他们把黄宗羲、章学诚这些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与王船山、顾炎武等人泛泛地等同起来,将之看成是时代思潮的一部分,这样实际上也就模糊了浙东学术自身的特点。注重史学和经世致用不仅是浙东的特点,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普遍特征。梁启超在他的著作中,一方面强调浙东史学的重要性,同时也承认他们在当时并不显赫和盛行,而且也说重视史学和经世致用是当时的普遍特征,“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①;“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文献学。”^②现代的许多学者也是倾向于把浙东思想家与当时的时代潮流等同起来,或许也正如李泽厚所说:“在这种意义上,章学诚也正是陈亮、叶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的所谓‘外王’路线的延伸与扩展。”^③总之,这样的理解在实际的结果上是模糊和消解了浙东学派的特点和存在的意义。假如浙东史学的特征与当时的时代潮流没有多少差别的话,章学诚也就没有必要写《浙东学术》,并将浙东之学上溯到陆象山、王阳明,将浙西之学上溯到顾炎武、朱熹了。事实上,在章学诚写《浙东学术》的前几年,章学诚就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将黄宗羲与顾炎武等同归于朱子学传人,结果被何冠彪等批评者当成了否定浙东学派存在的证据。因此浙东史学固然包含着经世致

①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第43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第189页。

③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4页。

用的内容和对史实的注重,但不能简单地与之相同,因为既然浙东学派在形式上缺少严格的师承关系,而且在内容上也缺少自己的特点,那么为人所质疑也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见,在对浙东学术的许多看法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模糊之处。说注重史学是浙东学派的重要特征,但我们却很难说清楚“六经皆史”的准确含义。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做了一番考证,最后认为“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① 钱锺书将“六经皆史”之说上溯到庄子,以至很难为那些强调浙东史学是经世致用的人所赞同。仓修良就认为钱锺书的考证只是一些离开历史条件的“文字游戏”,“以致这一结论未免有些牵强并将问题简化了。”^② 陈亮的历史观,也存在着相当多的复杂之处。在浙东学派的地理环境上,有的说法认为是浙江优越的地理环境才造就了那些思想家,还有的说是浙东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才促成了学术文化上的繁荣。在浙东和浙西的关系上,一种趋向是强调两者的联系和统一之处,是像章学诚所说的“道并行而不悖”,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来,两者在历史上的差异又是始终不能忽视的事实。只有在两者差异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解释浙江思想家的那些特征。

三

对于上述的种种情况,要想做出有效的解释,必须要摆脱那种有限的视野,将浙江的文化和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变迁中来进行考察。浙江毕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的部分,而部分的意义也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获得永恒的价值。在历史和现实中,无论是那些对浙东学术的认同还是批评都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它们都是浙江文化特征的真实存在。简单地站在文化认同的立场会凸现出某些方面,但也会使我们忽视另外的方面;同样如果仅仅是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场上忽视浙江思想家的意义,那样编写出的中国思想史也同样是表面和不真实

①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265页。

② 仓修良:《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0页。

的。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一个不断变迁和运动的过程,浙江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家在其中无疑占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位置。我们在研究浙江思想家的时候也不能仅仅限于某种寻章摘句式的称赞,而是应当从社会学、文化学等诸种角度去冷静地观察每一种思想的存在及其变迁过程。浙江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家的成就并不是简单地倡言功利,而是从他们独特的角度包含着对世界的思考。而且,浙江思想家对世界所做的那些思考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人类的思想息息相通的。在这方面,浙江历史上的许多思想不仅仅是服务于当今的市场经济,而且在整个人类思想中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如王阳明的学说曾经对中国社会及东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在同西方的哲学家的比较中也具有世界意义。浙东学派注重史学决不仅仅是一些经世致用或强调历史的进步等观点,而是包含着更为深广的内容。

研究浙东学派和浙江精神可以有多种角度,在这其中地理环境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因为每一种思想归根结底是植根于对自然的斗争,不同的社会组织由此而建立,一切思想和精神的差异皆由此而产生。对于浙江的地理环境,历史学家曹聚仁用他亲身的感受做了最好的叙述:

浙东浙西,说起来虽是同属一个行政体系,实际上绝不相同。浙西多水,除了于潜、昌化这一边,都是一苇可航。浙东呢,除了绍兴是水乡,温州、宁波沿海滨,其他各县,都是山岭重叠。严州、台州、处州各府更是崇山峻岭,仿佛太行王屋的山区。这样的地理环境,农村生产条件,绝不相同。在我的家乡(从前的浦江南乡,今日兰溪梅江区),百里周围,最大的富户,不会拥有两百亩以上的田地;说是要靠收租过日子,做一个不稼不穡的地主,我就没见过。大体说来,都是自耕农;即以我自己来说,我便知道如何耕种,如何收割,我家那几处水田,适于什么谷种,每亩会有多少收成。我们的田地,都是种三熟:稻熟以后种豆,豆熟以后种麦。祖父是贫农,先父也是泥脚出身的秀才,中年以后才办学堂兴教育的。这就和浙西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那儿,一年种两熟稻,如南浔张冢,擅蚕丝之利,还有万亩以上的土地;他们派庄主去收租,一个庄,总有几千亩田地,至于田地在那儿,田地种了些什么,他

们根本不知道。地主下乡去,佃户要摆香案来迎接。佃户交不出租来,地主可以叫家丁动板子打佃农的屁股。这都不是我们浙东人所能梦想的。浙东宁波绍兴的生产条件,比我们金华人好得多。(宁波人会做生意,绍兴人做师爷,别种财路很通达。)因此,二十岁以前,我除了看戏,没听说过“老爷、少爷、小姐、少奶、夫人”的称呼,我一生绝对不许男女工人称我为“少爷”或“老爷”。所以,浙西属于资产阶级的天地,浙东呢,大体上都是自耕农的社会。浙江省城,便是闻名世界的杭州,南宋时期的京都。从我的家乡到杭州计三百六十华里之遥。一位浙东农村的庄稼人要进省城一回,那真是天大的事。一百农民之中,一生中到过杭州的,怕不会有一个,所以浙西的事,跟我们浙东人毫不相干。^①

浙东在这样的地理环境的基础上,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浙东学派及浙江精神的特征。浙东的学术特征假如要用一些简单的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如笔者的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说的,是带上了某种非主流的特征。^②这里的非主流包含了自然环境以及文化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等内容。浙江自南宋以来尽管出现了经济和学术文化的繁荣,但它在历史上只是东南一隅,中国文化的中心历来是在中原,那里曾是先秦理性主义的故乡。唐宋以后,尽管经济文化的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在清代有皖学、吴学、扬州学派,但浙江与文明的中心始终有着某种距离和差异,差异的程度也随着距离而改变,从浙西到浙东就是这样。在浙西我们看到有密布的河网,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在浙东却主要是山陵和小自耕农的田园。运河的开凿,宋室的南迁都加速了北方的文化对东南的扩散和影响,但在这影响之下产生的文化却和原来的东西有着若干差异,这就像 20 世纪的亚洲世界也深受西方的影响,但始终不同于西方一样。浙江历史上的文化,尤其是浙东的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它受到文明火光的照耀,但又始终处于某种边缘状态,处于辉煌与幽暗、文明与野蛮的边缘,正是在边缘状态上的不同力量的撞击和融合,才孕育出了浙江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家。钱穆曾谈到先秦文化中心的转移,那时正是从较文明先进的地区

①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42 页。

② 陈锐:《浙江思想家与非主流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第 54 页

向较落后地区的转移过程中才出现了文明的辉煌。汤因比相信文明的产生是由于两种力量的撞击,那些浙江历史上的思想家的活力可能也正由于此。

四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解释历史上对于浙东学派的那些复杂的态度了。那些对浙东学派的自我认同或者是批评实际上都是由于他们站在了不同的立场而已。文明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的组织结构,你站在不同的位置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假如你处在类似浙东那样一些远离文明的半幽暗状态里,就很可能像章学诚等人那样去寻找某种文化的认同。假如你生活在类似曹聚仁所说的浙西的资产阶级的世界里,又很可能对那些文化的认同不屑一顾。像杭州正是浙东与浙西的分界之处,也就必然带上了某种中间或过渡状态的特征。这样来自杭州的章太炎、龚自珍等人的思想特征可以得到解释,章学诚对抗戴震的心理上的需要也是很自然的事。每一个人对历史上的思想家的评价都是和他个人的气质密切相关的。后世的学者对浙东学派之所以会持不同的态度,可能也像余英时所说的章学诚一样,不能免除心理和气质上的特征,章学诚自己就强调一切学术本于性情。那些在个人的成长中较为接近文明社会,较为理性和较多现实感,或者说偏好史料和考证的人很可能就对不具有师承关系的浙东学派以及那些空洞和抽象的思想上的联系没有多少好感;而对浙东有好感的也往往是那些较多思想上的活力,较为喜欢理论的那些学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具有重要的成就,但缺少许多史学家所要求的那种客观性。章学诚也强调自己不长于考证,但其《文史通义》有一种不同于刘知几的“史意”,章学诚被人所指责的“虚浮”、“蹈宋人语录习气”,或其所具有的成就都是由于这一点。在20世纪初,像梁启超和胡适等之所以对浙东学派有好感,是因为他们正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思想上较为认同于那些来自南方的带有非主流特征的思想家,比较注重地域因素对思想史的影响。而在这以后,当学者在和平时代的书斋里考